学术专论

1868 年前后汉字汉文在日本之状况

曹　雯

[摘要] 19 世纪中叶，最初由欧洲发起并逐渐向欧洲以外地域推广的现代化运动开始波及东亚。与中国不同，在经历了最初的徘徊之后，日本转而坚定走上欧洲现代化历程。这一努力方向使得日本很快便面临如下问题：用怎样的语言对民众实施教育。而近代日本语言的改良首先面对的便是如何对待自己语言中的汉文抑或汉文字这一问题。于此，民间舆论开始分化：是全部废除汉文字，还是对汉文字的数量进行适当删减。通过本文的观察可知，在近代教育尚未完全展开的 19 世纪 60 年代末，主张以假名文字或洋文字为国字的激进改良者的提案并不能得到政府抑或民间的回应，即便如福泽渝吉般的温和改良者所提出的倡议也不能有效激起社会的反响。日本文字的改良尚有待于具有初步近代西方意识的知识者的成批涌现，他们将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基础力量。

[关键词] 汉字　汉文　近代日本语言　改良

[中图分类号] K3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4）－04－0074－15

前言

19 世纪中叶，最初由欧洲发起并逐渐向欧洲以外地域推广的现代化运动开始波及东亚。在这场运动中，有的国家因固守自我而不可避免地跌入衰退的境地，有的国家因弱小不及反应而被掠食，有的国家则从最初的反抗情绪中摆脱而出转向积极投入这场改造运动以期脱胎换骨。那么，何为欧洲现代化模式？一言概之，此乃造就富国强民之势的发展模式。成就富国强民的前提有如下两项：一为国民须持有爱国之心，一为国民当奋发学习技艺。而实现上述前提者又在于教育。若此，对国民实施怎样的教育，实乃富国强民之势能否形成之关键所在。

与中国不同，在经历了最初的徘徊之后，日本转而坚定走上欧洲现代化历程。这一努力方向使得日本很快便面临如下问题：用怎样的语言对民众实施教育。日本属于汉文字文化圈，明治时期以前，封建制度尚未打破，汉文字以及以汉文字为载体的汉文在日本的地位牢不可破，阅读汉文并以汉文进行书写是士阶层表明自己尊贵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而普通民众（庶民）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接受汉文字教育的机会或资格。虽然日本文明开化之前的文章语不尽是使用汉文，也有汉和混用的体例存在，然混入汉文中的和文字并非世间所流行的日本口语，而是对汉文进行训

[收稿日期] 2014－06－27
[作者简介] 曹雯（1968—），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2；caowen330@ sina. com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以语言的交流互动为中心”（08JJD770090）经费资助。

读（即以和文字对汉文进行释读）的产物。也就是说，与所有尚未开启欧洲现代化历程的地域一样，日本语言中的文章语与口语亦分开使用。比起中国，日本的情况更加复杂，即中国只是在用自己的本土语言，只不过这些语言分成了文章语和口语两个部分；而日本除了自己本土的语言分为文章语与口语外，身为外国语的汉文又是其文章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日本的文章语其实有两个部分组成：汉文和日本语言中的文章语，本文将后者称之为和文。其中，汉文的地位又要高于和文。换言之，进入教育阶段的日本人，其对于外国语言学习的重视更甚于本土语言。这样的教育方式显然无法打开对民众开展普通基础教育的局面。对语言实施改良遂排上日本发展的日程。

近代日本的语言改良首先面对的便是如何对待自己语言中的汉文抑或汉文字这一问题。语言要简化，必然应削弱难学难记的汉文字的存在程度。于此，民间舆论开始有分化：是全部废除汉文字，还是对汉文字的数量进行适当删减。前者的主张显然过于偏激，既不能得到政府的回应，亦很少能获得民间舆论的同情；而后者的观念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逐渐成为关注现代化运动的有识之士认真考虑的改革目标。回顾近代日本语言之改良，其过程漫长而复杂，虽起始于幕末，然至19世纪90年代，改良之雏形亦不过初步确立。本书写作目的即在于揭示这一复杂而漫长的语言改良的初期阶段。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在观察汉文字在近代日本之地位变化这一课题时，并不会将目光只停留在民间舆论上，而是时刻将民间舆论与政府作为间的关联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即怎样的民间舆论获得了政府的回应，政府的作为又招致了怎样的民间舆论，继而新一轮的民间舆论又促使政府采取了怎样的改革措施。笔者相信，只有透过上述方式的观察，才能多少窥得汉文字在明治初期日本的真实处境，以防止简单地将任何一种民间舆论（比如全盘西化者的言论）直视为当时真实社会状态这一思考模式对现今知识者的影响。

一、汉字、汉文在日本

黄遵宪《日本国志》里如是说道"日本之习汉学萌于魏，盛于唐，中衰于宋元，复起于明季，迨乎近日几废而又将兴。盖自王段博士接踵而来，于是有论语五经而入始识字，隋唐遣使冠盖相望，于是习文章辞赋而君臣上下始重文，惟中间佛教盛行，武门迭起，士夫从事金革，不知有儒，汉学一线之延，仅赖浮屠氏得以不堕，而迨德川氏兴投戈讲艺，藤林诸人卓然崛起，于是有为朱程学者，有为陆王学者，有为韩柳之文、王李之诗者，益彬彬称极盛焉。"① 这段文字简略介绍了汉学在日本发展之历程。由此可知，汉学在日本兴盛的时期多为中日政府间有交往的时代，即多为日本仰慕中土而通使输贡的时期。不过无论兴盛抑或衰微，自汉学输入日本起始，汉学等同为学问这一观念即便进入明治时期以后亦广泛被日本人所认同，也就是说在西方实学尚未被纳入学问这一领域之前，放弃汉学即如同放弃学问，而放弃汉文字即如同放弃汉学。

"日本古无文字，而有歌谣，上古以来，口耳相传，汉籍东来后，乃假汉字之音而填以国语，如古万叶集所载和歌，悉以汉字填之，既开后来用音不用意之法，然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自草书平假名行世，音不过四十七字，点画又简，极易习识，而其用遂广，其用之书札者，则自闾里小民贾商小工逮于妇姑慰问男女赠答，人人优为之；其被之歌曲者，则自朝廷典礼、士官宴会，逮于优人上场、妓女卖艺，一一皆可播之声诗，传之管弦。"② 由上述可知，日本本无文字，只有口语。汉文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开始以汉文字来标注自己的口语以记录自己的口传历史，而学问部分则完全承袭汉学。即借助汉字，日本人可以将日语（口语）书写下来，但是诸如政

---

①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学术志二，第338页。

② 黄遵宪《日本国志》，第9，学术志二，第345页。

治、学术方面的书籍或文书，仍以汉文进行表述。庶民虽然不学习汉字或汉文，但如“本”、“饭”、“茶”、“碗”、“肉”等之类的日常用语也进入口语，被人们所接受。①

然而，随着假名文字（即和文字）的问世，以假名文字混合汉文字进行书写的方式在上下层社会，尤其在女性以及庶民阶层里得到推广。据明治时期的语言学家佐藤宽的研究整理，假名的制作本为释读汉文而起，最初假名只有日本奈良时期的政治家兼学者吉备真备制作的片假名，它流行于男子间，用于汉籍的训读或汉文的直译；后来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师空海创造的平假名则是为日常生活所需而诞生，它流行于女子间，用于书写日常见闻以及故事。② 假名后来被日本人作为自己的国字，明治时期的文字改良者曾经幻想：若当时的日本人只使用国字即和文字，那么汉文字就会逐渐被废弃，假名的连字法以及使用规范亦会逐渐形成，也相应就不会出现像今日汉文字已成为日本文字的一部分并被普遍使用的尴尬局面。③ 佐藤宽的幻想是一厢情愿，若日本从假名文字诞生起便抛弃了汉文字，也就等同于抛弃了吸储大陆文明的工具，那么日本又如何能积累出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温床的江户文化?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对日本人来说，汉学的起点即掌握汉文字绝不是项简单易行之事。佐藤宽在谈及日本语的特性时说，日本语言分为多音语和单音语两类。顾名思义，多音语由数音组成，比如“川”字读为“かわ”，由两个音组合而成；单音语则是一音一语，比如“身”读为“み”。另外，和欧洲语言一样，日本语的语词也有语尾变化。而这些特点显然与中国语所呈现的面貌不同。在中国语里，一语一音，没有多音语，均是单音语，并且语尾不会发生变化，因为虚词可以帮助语词完成变化。④ 曾热衷研究日本社会的黄遵宪也述及自己对日本语的感受。他总结了以下三点“1，其音少。其土音只有四十七音，四十七音又不出支微哥麻四韵，一切语言从此而生。2，其辞繁。音皆无义，必联属三四音或五六音而后成义，即不同泰西字母有由音得义之法，又不如中国文字有同音异义之法，仅此四十七音以统摄一切，语言不得不屡换其辞以避重复，故语多繁长，如称一我字，亦有四音；称一尔字亦用三音，他可知矣。3，其语长而助辞多。日本语言全国皆同，而有上下等二种之别。市井商贾之言乐于简易，厌其语之长，每节损其辞以为便，而其语绝无伦理，多有不可晓者，故士大夫斥为鄙俗，凡士大夫文言皆语长而助辞多，一言一句必有转声，必有余辞，一语之助辞有多至十数字者。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如读书则曰书读，作字则曰字作之类。”⑤ 而学习汉文的日本人必须要克制上述自己生活中的语言习惯，去适应汉文字以及汉文的特性。

然而，“强袭汉文而用之名物、象数，用其义而不用其音犹可以通，若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循用汉文，反有以钩章棘句诘曲聱牙为病者，故其用假名也。”⑥ 也就是说，当日本人深受因中日语言差异所带来的困苦后，便创造了假名来帮助他们习学汉文。日本官修史书《古事记》的作者安万侣在其序里亦谈到假名与汉文间之关系，其言道“然上古之时，言意并朴，敷文构句，于字即难，以音训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达者，事趣更长。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即辞理叵见，以注明意。”⑦ 具体说，以多音语的日本语去对应一字一意的汉字，会使句子变得冗长复杂；然若均以汉字进行传达，则文章理解会变得非常困难。结果，在既不能放弃汉文字或汉文又要方便读者理解文章意思的前提下，日本人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将假名适当混入汉文，采用和汉混用体例进行书写。以黄遵宪之言“或如译人之变

---

① 实藤惠秀《近代日中交涉史话》，春秋社，1973 年，第 4 页。
②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文明馆，1891 年，第 67 –68 页。
③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68 页。
④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25 页。
⑤ 黄遵宪《日本国志》，第 9，学术志二，第 344 页。
⑥ 黄遵宪《日本国志》，第 9，学术志二，第 344 –345 页。
⑦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59 页。

易其辞，或如绍介之通达其意，或如瞽者之相之指示其所行，有假名而汉文乃适于用势，不得不然也。”① 然上述和汉混用体具有宽泛性，即假名文字的加入量依据写作者汉文修养的高低来决定，其间依然有坚持不用假名文字的纯汉文书写，这导致日本文章的书写体例不一而繁多。

比如自空海创造平假名后，以平假名进行写作的文章开始出现，日本人称之为“和文”。比较著名的作品就有《竹取物语》和《伊势物语》。这些作品虽然基本以平假名写成，但其字法以及句法却遵循汉文的行文规则，而且用词高雅，被日后的咏歌大量引用，到近代日本人称之为“雅文”体的文章便是多依循上述规则进行写作。有例如下:

> 年立ちかへるあしたの空の氣色、なごりなく雲らぬうららげさには、数ならぬ垣ねの内だに、雪前の草若やかに色づきろめ、いつしかと氣色だつ霞に木の芽も打けぶり、おのづから人の心ものびらかに見ゆろかし（源氏初音之卷）②

在古代日本，以雅文体进行创作的多为女性，虽然以平假名为主，但关键词语依然使用了汉语，因此可以说雅文体是一种偏重和文字的和汉混用体。与女子行文不同，日本贵族时代的男子为体现自己的修养，多以汉文或汉文直译体方式进行写作。我们来看看汉文直译体下《庄子》中的某一节。

> 昔シ莊周夢ニ胡蝶トナリ、栩々然トシテ胡蝶ナリ、自ヅカラ志ニ適スルニ喩フルカ、周ヲ知ラザルナリ、俄ニシテ覚ムレバ、則遽々然トシテ周ナリ、知ラズ周ノ夢ニ胡蝶トナリシカ、胡蝶ノ夢ニ周トナリシカ、周ト胡蝶ト自ヅカラ分アラン③

原文：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

不难看出，这种文体确实是对原文的一种直译，而且假名部分使用的是片假名，片假名之地位高于平假名由此可见。男子行文使用汉文或汉文直译体的结果，一是汉语成为男子日常习学的语言，二是汉语逐渐进入交流语言，继而和汉语言混用的现象不仅出现于口语交流场合，而且走入书写，像民间流行的《保元平治物语》、《源平盛衰记》、《太平记》等军记作品所采用的书写体例就是一种有别于雅文、在汉文直译体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文体，它的难度介于雅文体与汉文直译体之间。例如:

> 深宮ノ中ニ向テ、春ノ日ノ暮レ難キコトヲ歓ゲキ、秋ノ夜ノ長キ恨ニ沈マセ給フ、金屋ニ人ナクシテ、耿々タル、残ノ燈ニ背ケル影、薫龍ニ香消エテ、蕭々タル、暗雨ノ窓ヲ打ツ聲、物毎ニ皆御涙ヲ添フル媒トナレリ、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楽由他人ト、白楽天ガ書キタリシモ、理リナリト覚エタリ（太平记）④

至镰仓幕府时期，世风首重武道，其倡文教，又及乱世，故汉文逐渐衰微，具有日本国风之雅文亦随之衰退。汉文之衰微可从《贞永式目》、《东鉴》等作品中得到明证，而雅文之衰退则依据《十六夜日记》、《徒然草》等作品可以知晓。其行文比汉文直译之变体更为简明易懂。至德川幕府时期，形势又一变，文运昌盛，学士辈出，汉文复兴。不过又有哀叹雅文衰微者横空出世，在民间发起复古运动，代表者有嘉茂真渊和本居宣长，被世人称为国学者。复古运动的实质是复兴日本中古之雅文，其直接结果是，在嘉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的带动下，村田春海、清水滨臣、藤井高尚等一批长于雅文体的学者相继辈出并受到社会关注且被模仿，这意味着男子抛开以往成见，也可用雅文体——一种日本古代女子的行文体进行书写。⑤

---

① 黄遵宪《日本国志》，第 9，学术志二，第 345 页。
②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81 页。
③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82 页。
④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83 页。
⑤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76—79 页。

在江户时期，国学者嘉茂真渊等人大力倡导“和文”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对作为官学的儒学所进行的挑战。但这时期的挑战对于儒学即汉学的地位尚未构成威胁。比如江户中期古文辞学派的创立者——荻生徂徕对于汉学的尊崇与国学者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荻生徂徕为追求纯正的汉学要求就学者应首先学习汉语。和汉混用体的最大问题在于："心移中华文字以就方言者，一读便解，不解不可读。信乎，和训（此方学者以方言读书，号曰和训）之名为当，而学者宜或易于为力也。但此方自有此方言语，中华自有中华言语，体质本殊，由何弥合。是以和训回环之读，虽若可通，实为牵强。而世人不省，读书作文一唯和训是靠。"以致"倘访其所以，解古人之语者，皆似隔靴搔痒。"遂提议"学者先务，唯要其就华人言语，识其本来面目。"①

如何追求纯正的汉学，荻生徂徕有自己独特的教授方法，即"先为崎阳之学，教以俗语，颂以华音。译以此方俚语，绝不作和训回环之读。始以零细者，二字三字为句，后使读成书者。崎阳之学既成，乃始得为中华人。而后稍稍读经子史集四部书，势如破竹。"② 关于崎阳之学，荻生徂徕是这样解释的"先随例授以四书小学孝经五经文选类，教以此读法。时时间择其中极易解者一二语，随分俚言解说，使其自得。一日间不过一二次，切勿说旨章及道德性命之理。大抵人心喜开通，恶闭塞，虽蒙生，日但诵全无分晓语，必生厌想，惰气乘之，仅得可解者，则生踊跃，由是精进，且其一二零细，后来合凑，比为自用力地。比五经皆毕，既自得力，乃授以史汉有和训者，使其自读，副以字书，备其考索。"一遍不通，更读二三遍，"不许其辄忘所疑，常要蓄在胸中"，然后"日日如此读书，积以卷数，自然涣然冰解。"③ 荻生徂徕的读书法颇有中土之风，然心不静则无法持续，而获有此心境者亦绝不在多数。

不过如前所述，无论采用何种体例，写作者在写作时均遵循汉文规范。于是，这又带来其他问题。详言之，各国自有各国的语言，其文章语本应遵循其口语的顺序进行书写，然而，日本人因为书写时要循序汉文规范，这就使得他们必须打破日本口语的顺序去适应中国语，除此之外，与中国语一字一音的特征相较，日本语又多是一字多音，由此种种因素所造成的言文不一致现状着实给日本人带来极大不便。④ 所以不难想见，在明治时期到来之前，日本习学汉学者仅为有余力的少数者，他们是组成"士"这一阶层的社会显贵以及为"士"服务的一部分特殊庶民。他们从小在贵族学校即藩校里接受汉文字、汉文教育，学习汉学，追求学问，继而掌握日本的政治。即履仕朝廷者多习汉学，从诏敕谕达等政府文书，至诸学者之著述，大多采汉文直译体。⑤ 我们不妨看一下被视为明治维新之发端的政府公告文书——《五箇条の御誓文》的书写体例。

一　廣ク會議ヲ興シ萬機公論ニ決スヘシ

一　上下心ヲ一ニシテ盛ニ經綸ヲ行フヘシ

一　官武一途庶民ニ至ル迄各其志ヲ遂ケ人心ヲシテ倦マラサシメン事ヲ要ス

一　舊來ノ陋習ヲ破リ天地ノ公道ニ基クヘシ

一　智識ヲ世界ニ求メ大ニ皇基ヲ振起スヘシ

我國未曾有ノ變革ヲ爲ントシ朕躬ヲ以テ衆ニ先ンシ天地? 明ニ誓ヒ大ニ斯國是ヲ定メ萬民保全ノ道ヲ立ントス衆亦此旨趣ニ基キ協心努力セヨ

年號月日　御諱⑥

很显然，它使用了汉文直译体。这种文体随着明治维新的展开开始发生变化。

---

① 荻生徂徕 《译文全谛》，须原屋书店，1908 年，第 2 页。
② 荻生徂徕 《译文全谛》，第 8—9 页。
③ 荻生徂徕 《译文全谛》，第 9—10 页。
④ 佐藤宽 《日本语学新论》，第 40 页。
⑤ 佐藤宽 《日本语学新论》，第 79 页。
⑥ 《太政官日志》揭载，1868 年 3 月 14 日。

二、汉文字废除的倡议者——前岛密

在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就出现了废除汉字论者。其代表人物是前岛密。出身于富农家庭的前岛密在 1847 年（弘化 4 年）即 12 岁时就前往江户即东京学习医学并兰学，至 1865 年（庆应元年）进入当时萨摩藩的西式学校开成所教授兰学，翌年成为幕臣前岛家的养子，改名为前岛来辅。同年 12 月，以前岛来辅之名，以开成所兰学讲师及翻译人员之身份，向当时的将军德川庆喜献上建议书—— 《汉字废除之议》。比照前述国学者们的倡议，前岛密的行为其实是在他们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即将雅文体所体现的假名文字化做得更加彻底一些。

从前岛密的人生经历看，他并非出自武士家庭，只是家境比较好，可以送他去东京学一项技艺以便谋生，他因为选了医学，所以有机会接触被幕末日本称为早期西学的兰学，兰学对日本社会所带来的主要影响正是医学，前岛密即遵循由医学—兰学—西学这一途径对西方文物逐渐产生兴趣并最终投身于日本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引入西式教育理念以改良日本社会现状是前岛密上呈 《汉字废除之议》 的动机。他在开篇即说，国家之大本在于教育，其教育对象应不论士、民，而须囊括所有国民。为了教育普及，应尽可能使用简单文字来书写文章，但目前先掌握其深邃高尚之百科学问中之文字，再知晓其中道理之教授法却不合时宜，实不可为。他提出的办法就是，日本应效仿西洋诸国，使用音符字（即假名文字）而非汉字于民众间普及教育，力促达成在公、私文章中逐步并最终废除汉字之目的。①

对于这样的提议，前岛密不是没有自己的顾虑。他十分清楚，废除汉字即意味着要求日本民众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习惯——凡学问，只能以汉字进行表记，只能以汉文进行传达，深知若遽然不用汉字实非易事。但是鉴于正逢国家多事之秋，人人讲求救急方策之际，为使日本早日与列国并举于世，他抛弃个人顾虑，毅然上呈私见，希望为了国家之大本，朝廷应认真商议此事之可行性，并征询诸藩的意见，以期能逐步推行。②

前岛密眼中的国家大本即在于建造国富民强之日本，而实现国富民强之关键在于民众之教育普及。他指出，日本只有开展降低学习难度的普通教育，才能全面提升国人之知识水平以及精神修养，以使得他们初步具备明晓事理的能力。他解释，所谓教育普及是以最简单、最广泛、最迅速的方式来对民众实施教育，而如果在教育普及阶段使用汉字，这样的目标显然很难实现。因为学习字形以及音训费时耗力，所以教育周期过长的弊端根本无法避免。他指出，其实正是因为汉字、汉文之学习过程冗长且艰难不易，才造成日本目前的就学者少之又少；即便是勤勉向学的少年，为追求古学而徒然将最珍贵的年华消耗于无益之象形文字的记忆，以致错失了在他们最为美好的少年时期去通晓诸般事物的良机。③ 于此我们知道，前岛密所谓明晓事理或通晓诸般事物，已不仅指称 “古学” 抑或汉学，它更多意味着西方之实学即各项技艺之学。而少年向学者仅习汉学，不习西方实学是诸如前岛密一般的维新者最感痛心疾首之处。

在探讨假名文字是否完全可以充当国文字的问题上，前岛密充满信心。他相信，在言辞的表述上，日本并不落后于西洋诸国，即日本的五十音符字（即假名字）能够表述一切事物，不存在缺失了汉字，于某事某物之解释抑或表述将无法完成的现象。他甚至认为汉字之输入，只是日本中古时期的人们毫无见识的一种行为，而这种不便无益之象形文字的输入并引为国字的行为是

---

① 前岛密 《汉字废除之议》，《国字国文改良建议书》，非卖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1899 年，第 6 页。

② 前岛密 《汉字废除之议》，第 6—7 页。

③ 前岛密 《汉字废除之议》，第 8—9 页。

导致日本人长期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的直接原因。他痛惜日本国力之所以如此不振，究其原因，实为汉字所误。① 前岛密的这番言论在当时实属大胆而偏激。从他并未接受过系统儒学教育的经历来看，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事实——当时的日本社会文物基本依据儒学而建构。

为了增强自己说话的分量，他引用一位美国传教士的言论来说明此事。这位传教士早年在中国传教，一直滞留至咸丰年间，在中国期间，勤于中国语学习。后来他来到长崎，去了前岛密所执教的开成所学习日语，与前岛密闲话之余谈及他在中国的经历。他说曾经有一次路过一所宅院，只听门内有少年喧嚣之声，敲门入内询问情况，知其为一所学校，喧嚣声乃读书之声，是中国人之学习方式，先生并不讲解文意，只要求学生强诵强记文字。他叹道如此苦读苦记经书古籍的学习方式不知荼毒了多少中国人，中国之所以萎靡不振，人民之所以野蛮未开而每每受辱于西洋诸国，究其原因，即在于其教育方式。他又说，日本则不同，日本有句法、语法均很成熟的国语，有可以表达如此国语的易记易学之假名文字，但可惜日本却不能专用这样的简易文字，反而一味使用句法、语法均不能自由变化的复杂汉字，并以其主导普通教育，此举必定使得原本活泼而有生命力的日本人民转而成为愚钝且衰弱的人种。于此，前岛密附和说汉字确为一种荼毒人们精神的麻痹剂。他承认这样的说法可能会招致将汉学奉为最上等学问的国人的批判，但他坚信他有揭开真相的责任，以期世人幡然醒悟。②

在谈及如何废除汉字时，前岛密特别强调，废除汉字，并非指废除因汉语输入而被日本吸收的所有辞语，只是说在书写辞语时应以假名文字替换所有的汉字。例如，“今日”可写成“コンニチ”，“忠孝”可记为“チウカウ”等，遇到诸如“桥”、“箸”、“端”等字的日语发声均为“ハシ”的情况时，为避免混淆现象的发生，可制作专门的文典给予规范，并应编纂辞书以统一句法、语法之变化规则。③ 他解释说上述形式的文字改良可以获得以下好处：一是可防止因汉字一字多义而引发的混用情况出现。例如，“骚乱”中的“乱”字和“乱臣”中“乱”字可以自然区别开来；遇到“大将军”一词时，不再会将其误读为“大将”的“军”或“大”的“将军”等。一是因汉文没有句法、语法之格（时态）的变化，必须根据上下文以及虚词来判断格（时态）的变化，这很容易造成误读，而使用假名文字则可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④ 于此，他提出将谈话笔录下来即为文章应是日本未来国文的发展方向，以为像今日将谈话与文章截然分为两开的作法实有碍于日本学术的进步，因此必须打破这种现状，实现谈话与文章的相融合。⑤ 前岛密所谈及的言文一致在三十多年后成为日本政府所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仅凭借此一点，完全可将前岛密划入日本现代化运动先驱人物的行列中去。

废除汉字是为了普及教育，那么普及教育的目的又在于何处？前岛密于建议书内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爱国心，在于培育自尊独立的国民性，并强调此乃国家富强之关键所在。这是笔者在日文资料内所看到的“爱国心”一观念被提出的最早记录。根据前岛密的解释，“爱国心”是指每个国人均以本国为无上至善之国家，均满怀自尊之志，并保持其不屈不挠之气节。他进一步说，时至今日，若欲养成大和魂，除发扬此真诚之爱国心外，别无他法。而爱国心之培育又在于拓展普通受教者的知识，然目前以汉字为主的教育方法实有碍于此项事业的发展，故改良教育方法势在必行，其要旨在于废除汉字，在于减少读书习字的时间，即减少为暗记文字之形画和发音而耗费的时间。他分析说，对于一般的少年学子，不习汉字、汉文，可节省他们五到六年，甚至七到八年的学习时间，这些被节省出来的时间可用于学习实业即兴业置产方面的知识，

---

① 前岛密《汉字废除之议》，第 9—10 页。
② 前岛密《汉字废除之议》，第 11—13 页。
③ 前岛密《汉字废除之议》，第 13—14 页。
④ 前岛密《汉字废除之议》，第 14—15 页。
⑤ 前岛密《汉字废除之议》，第 16 页。

此实为当下之治国大事。①

前岛密归纳说，就日本当时之教育状态，可分为上下两等。下等教育之受教者，仅局限于掌握姓名、消息的书写方法抑或只须记住其职业方面的少量相关字词，对于宇宙事物之诸般道理毫不知晓，对于外国之发展状况亦知之甚少，处于上述状态下的受教者如何能生发出爱国心？上等教育之受教者，其教育过程大致为先由习学四书五经而渐至涉猎中国历史，再由习学文物制度而渐至考证治乱兴败之事迹。他以为这样只注重古典历史的学习极易造成受教者尊彼卑己的心态，而抱有这样心态的受教者往往对汉学以外的知识不感兴趣，也就是说，这样的学习方式只令受教者停留在了解中国各项事物之范围内，对于中国以外的兴趣，至多不过是再阅读一些西洋书籍，处于如此状态下的受教者又怎能生发出爱国心?② 依据前岛密的分析，日本当时的上、下等教育方式均有碍于爱国心之生成，那么，受教者应接受怎样的教育才能获得爱国心呢？前岛密给出的答案是拓展受教者的知识面，尤其是培养日本自身学问的独立意识。

他说，普通教育首先当在于了解本国事物而非他国事务，并且应能以本国语言教授本国事物（此乃学问独立之精要），如此方能对少年之辈灌输爱我尊我之观念，而如今先他后我之教育方式实为本末倒置之举，不利于日本独立自尊风气之形成。他举例，学者论道，均以做尧舜之民为荣；谈及英雄，必以诸葛孔明为榜样，日本现如今屈人邦俗之下之状态岂非主客颠倒？他叹息道，与西人谈论日本，每说及大和魂，对方皆云日本所谓大和魂，不过是以汉学为中心进行学习后的产物，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国魂；近来，西学又渐入，日本若不将此本末颠倒之状调整过来，那么又一种西洋魂必定会渗透进日本社会，与旧有的中国魂发生冲撞或磨合，如此一来，日本魂或将彻底消亡。他提醒说上述言论或为妄评，但实应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③

如此，前岛密提出废除汉字的理由已不仅仅在于降低教育实施的难度，更在于实现日本学问的独立。他强调说，学问独立是日本当务之急，即当以国语即假名文字编纂德育（孝悌忠信等品行的培育）以及智育（历史地理物理算数等知识的教授）方面的书籍，分成上下两个教育等级，按照先我后他的顺序对受教者进行传授。④ 他解释说，培育爱国心固然重要，但应注重受教者德智双方面的发展。他说现在的教育，只向少年传授何为“仁义”、“明德”、“治国平天下”等老夫子或老道的执政者都难理解的诸般大道理，以致白白消耗了他们宝贵的学习时间，教育并不应该仅仅是这样道德层面上的学习，诸如物理、技术等实用学问也理应成为教育内的内容。他痛惜道：长久以来，吾辈均以技术为贱业，技术之学习向不被学校所接纳，此实为造成我邦工艺陋劣、风教浮薄、贫弱不振之真正原因，故吾辈当从今日起一改此风气，力促自尊独立新气象之形成，此乃培育并加固国人爱国至诚之心之关键所在。而日本贫弱之缘由即在于日本对于学问追求的方式方法均不适宜，若要有所起色，当从普通教育方面着手。他也预测到教育改良所将遇到的巨大阻力，承认目前学者中的大多数仍极力主张维持旧状，但他坚称此等俗儒庸士不识大局，终是误国，寄希望于朝廷能力排众议，英明抉择，以成就日本空前绝后的大事业。⑤

前岛密的废除汉字论实质是一种对待汉学的态度，是要向世人宣称学问不等同于汉学，除了汉学，人们更应将目光转向能带来国富民强的西学。前岛密以一名在南方萨摩藩洋学堂——开成所的兰学执教教员向当时最高的执政者——幕府将军提出上述建议，其行为虽可谓勇气十足，奈何人微言轻，没有记录显示当局者对于前岛密的建言有任何回应。不过，前岛密的行为代表着日

---

① 前岛密 《汉字废除之议》，第 17—18 页。
② 前岛密 《汉字废除之议》，第 19 页。
③ 前岛密 《汉字废除之议》，第 20—21 页。
④ 前岛密 《汉字废除之议》，第 21 页。
⑤ 前岛密 《汉字废除之议》，第 22—23 页。

本维新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对于幕府执政者的守旧态度开始不满，要求改变的呼声日胜一日，最终导致幕府政权的崩溃。

三、明治初期的汉字废除言论与明治政府的对应

明治维新后，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成立。在推翻幕府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萨摩藩藩内武士们成为新兴中央政府内的掌权者，曾为开成所教员的前岛密亦乘势进入中央政府，成为民部省的一名小官员。

入职中央政府的前岛密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志向，进一步向当局提议应及早改良国字、国文。根据《国字国语改良论说年表》的记载，前岛密于明治 2 年 5 月向集议院提交《关于国文教育之仪的建议》，并附录《国文教育施行之方法》、《废除汉字之私见》。①

国字、国语、国文是对照汉字、汉语、汉文提出的。对文字文章改良者而言，若无国字、国语、国文，则无日本学问之独立。前岛密继前《汉字废除之议》，再上呈《关于国文教育之仪的建议》，顺应逻辑，无可厚非。

在《关于国文教育之仪的建议》里，前岛密畅言明治维新乃千古未有之伟业，文武各般制度急待仁人志士给予革新，而置此百事待举之际，开民智为首当要务，若要民智开，又当及早实施教育普及，教育普及则有赖于教育体制抑或方法之改革。于此，前岛密坚称，废除汉字，以假名文字即平假名为国字，学习科目由伦理推广至物理、政理、法理等诸般事物应为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他进一步提出，经教育改革后，官、私用之普通文书抑或文章当全废汉字，只用简易的假名文字进行书写。他重申日本古来只学习汉字、汉文的教育方式不仅阻碍了学童的智力发展，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若日本要与智体均很发达的欧洲人民并存于世，除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外，别无他法。他沉痛指出，千年以来，日本无论历史记录，还是官私记载，均嗜用汉字，而近来部分汉学生甚至积极改造现行的文书体裁，希望以汉文体统驭所有官、私文书，这实在是一种违逆时代潮流的行为，对今后关乎国家兴隆之国民教育的实施极为有害。② 鉴于日本社会所出现的保守、倒退的局势，前岛密在上呈《关于国文教育之仪的建议》的同时，提交了国文教育施行的方法。

在这份计划书内，他将国文教育法的施行划分成 6 期来完成。第 1 期以二年为期，目标为在各府藩县招募和学、汉学、西学学者各 3 至 5 名，令彼等以国字制定国文体例并编纂国语国文之范例。与此同时，应另选取 10 至 15 名助手以及若干随员编纂国语字引（字典）。尤须注意的是，新纂国语应不论汉语、西洋语而广为收纳；文章范例不应以古雅文体为参照，当更贴近近体之俗文。第 2 期以二年为限，目标是以新定国文即假名文字编纂系列教科书。即诸如《古事记》、《日本书纪》、《大日本史》、《外史》等历史书籍以及反映日本其他事物的非假名体文本均应译成假名体；应被译成假名体的书籍尚包含已翻译过来的西洋书籍、正在翻译的西洋书籍以及反映世界各地状况的非假名体书籍；如果有必要，部分汉书亦应被译成假名体。于此，前岛密特别强调组织者应列出编纂以及译书时间表，以保证上述书籍尽早出版问世。第 3 期以一年为期，目标是中央政府命令所有府藩县于各自管辖区内选拔 2 名以上的传习生报送中央，这部分人员与之前参加新国文国字制定以及字典编纂的学者一同将成为实施新教育活动的第一批教师人选。第 4 期以一年为期，目标是中央政府再次要求各府藩县根据各自实情选拔一定数量的传习生报送中央，与由国外留学归来的传习生汇同，视作第二批新教育教师人选。第 5 期以二年为期，目标是开辟新教育实施场所，或采原有各府藩县的藩校，或采各村镇的寺院作为施教场所，然后令人数

① 国语调查委员会编纂《国字国语改良论说年表》，日本书籍株式会社，1904 年，第 2 页。

② 前岛密《关于国文教育之仪的建议》，《国字国文改良建议书》，第 26—27 页。

有限的教师巡回执教于上述教育场所，无论是原教育对象的士人，还是仅接受过有限教育的寺僧、社人抑或医师等庶民，均应成为新教育的实施对象。他强调，若要达成上述5期的教育目标，政府必须采取强制手段，并规定自某年某月起一切公文书均须以国字书写，汉字一律不得使用，并且为确保各府藩县积极执行各项措施，中央政府当以诏书形式颁布各项命令。前岛密计划的第6期不设年限，自第5期结束起至国民教育基本形成为止可视作其期限。这一阶段所要达成的目标是，必使得所有受教者接受的是不再依赖汉字的国文教育，即确立适合于全体国民的教育制度即教育普及法。①

在前岛密的蓝图内，我们看到，其第1期是要初步建立国字国文标准，其第2期是要出版一批以假名体即国文体书写的包含教科书在内的书籍，其第3、第4期是要选拔并养成一批从事新教育即国文教育的教师，其第5期是要利用现有教育设施、针对包含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受教者实施新教育。前5期是实施、开展第6期教育的基础，前5期所培育出的新教育种子人才将在第6期的国民教育普及中发挥巨大作用。前岛密在谈论新教育制度时称，它应该是一项极为讲究或极为完善的制度，即针对国民的阶级差异，需要设置出适合各个阶级即水平高低不一的教育科目；针对国民的职业差异，需要设置出适合各个职业的教育科目，所以因材施教应成为新教育制度的特点。他辨析说，与新教育法相比，从前的教育，只传授忠孝仁义之道，不分程度高低，不分职业差异，以致教育成效甚微，因此重建教育制度势在必行。

就如何建立国民教育系统，前岛密参照英国教育普及法的经验也给出了具体意见。他说，首先每百户人家即设置一所普通学校，凡男女幼童均可入学，以使得寻常子弟未有不登学者。其次，可在府藩县各辖区首府城市设置高级学校，凡入学之士、民应获同等待遇，并筹措公平奖学制度，以奖励勤学者。于此，他补充说，高级学校的毕业生应获得政府任用，即依据各人之学业水平，给予他们在各级官府以及下级村镇内获得某项职务的机会。第三，仿照英国的办法，在两京（东京、京都）设立专攻大学，内设各类教育科目，入学者可根据个人志愿选科学习。他建议，在建构以上三级学校时，所需的办学经费应由中央政府、府藩县以及村镇承担；普通学校（即小学校）、高级学校的教员可从前记第3、4期所言及的传习生中选拔，而大学校的教员则应以国学、汉学、伦理学、算数学以及从事西学凡十年以上的学者充任。② 前岛密所言及的国民教育体制后被日本明治政府称之为“学制”。

据《关于国文教育之仪的建议》，我们看到前岛密将文字改良作为实施新教育的第一步，即抛弃汉字而改用假名文字是建立新教育体制的关键。他在文末反复说，或有人说以5期7年时间基本建成国文教育体系过于仓促，尤以国字取代汉字更是一条不可预知的险途，但其实这只是习惯所造成的问题，一旦人们习惯了使用假名文字，7年时间反过来可能会觉得过长。他再次重申，关于废除汉字，只是指废除公文书内的汉字，至于私人文书，并不禁用汉字，甚至以汉文书写亦无可厚非，要之，日本可仿照英法等国，在专攻大学校内设置专门学科——汉学科，仅针对少数人群实施汉学教育即足矣。目前，国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目不识丁，少数受教者又只好浮华的文词和抽象的道德学，对于富国强民的实学毫无兴趣，若以现有的教育法对国民开展教育普及，岂不误人误国？他不无遗憾地说，预测新教育法的成效，较已经或正在受教育者，从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反而更能从新教育法中获得收益。他希望那些不愿革新的守旧者应充分认识到当今西洋与中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孰高孰低已分外明朗的事实面前，去汉学就西学乃势在必行之事，他更期待当政者于此国家亟待振兴之际当尽早做出决断。③

去汉学就西学乃至创立国学是幕末乃至明治初期的一股新风气，这股风气虽然尚未大张旗鼓

---

① 前岛密《关于国文教育之仪的建议》，第30—33页。
② 前岛密《关于国文教育之仪的建议》，第34—36页。
③ 前岛密《关于国文教育之仪的建议》，第37—39页。

成为一种潮流，但却是日本维新运动——西方现代化历程上的第一道微澜。即如在文字文章改良运动方面，前岛密并不是孤军奋战者，其同辈中不乏与其呼声相策应者，其中就有南部义筹。明治 2 年（1869）5 月，南部义筹向当时日本最高学府大学寮的学头山内容堂递交建议书——《修国语论》，在没有得到回应后，又于明治 4 年 8 月，直接向当时文部省的文部卿上呈该建议书，亦未得到任何回应，这与前岛密的遭遇是相同的。

与前岛密以汉和混合体上书不同，南部义筹的建议书是用汉文写成的，虽然文句有不通之处，但意思大体明了，况以如此程度的汉文修养，称之为半个儒士亦不为过。在《修国语论》里，他这样谈到须改良国语的理由，即“学问之道，西洋诸邦为易，皇国、支那为难，而皇国为甚。夫西洋之为学也，唯知二十六字，解文典之义，则无不可读之书，是其所以为易也。如支那不然，非读数百之书、通于数千之字则不可，是其所以为难也。虽然支那尚专矣，至皇国则加之，以和学与俗用之文，非并通之则不可，是故为学之难，莫甚于皇国也。文物之盛否，职此之由，欲育人才，不亦难哉。方今学者，或汉或洋，舍其本而唯末之务，是以解国语通于国典者甚鲜矣。其至如此也，非学者之罪也，政使之然也，何则？人情避无用而赴有用，犹水之就下也，孰能御之？自中古模仿汉制以来，诏敕制诰之文，必假力于汉籍而修之，日用之文亦如此者居多，故不学汉籍则不能成用也，且洋学者亦当今之急务也。至和学则不关今日之人事而殆属无用，唯为歌词之具而已，是则政之过也，学者之不修不亦宜哉？是以国语日失，而海内异词、言语殆不相通，是语学不明之由，岂可谓文明国哉？如此而不止，则堂堂皇国之语，或变为汉，或为英、为法、为兰，混杂磨灭，将至不可分辨，可堪慨哉。然则深察此理，而不可不起易学之学，而立令先务修国学之策也。”据此，他提出以下改良国语的办法，即“苟欲成之，莫如假洋字而修国语也。虽然世人泥因习，则必将谓不可用也，若平心察之，则有至理而存焉。然则断然用之可也。精精讲究，修皇国之史典，就汉洋之书籍，择其有补于治道者，与天文地理之书，译之以投书生而使学之，则不假力于他国之学而自得究天下之理通于万国情也，是非变难为易哉！而后诏敕制诰与日用之文皆用之，则阖国之人不得不修国学也。夫如此则海内同辞而无不相通之患，然而阖国之人，必先修国学，而后或汉或洋，从其所好修其业，则本立而成焉。”因此他坚信，改良国语是“今日之急务，育才之本也，其可忽哉。”而且，只有改良国语，“人才之成立，文物之勃兴必将至，不可与今日同日而论也。”或者有人会对他发出诸如“虽然假洋字，则无伤国体乎？”般的非难，他的回答则是“是何伤，自皇国见之，汉与洋同是他邦也，何其择焉。今欲假洋字而修国语，较之并字语而假之，失皇国固有之语，则何啻霄壤，然则断然改之而可也，奚疑哉。”① 他的观点很明确，与其并和汉字而为国语，不如只取洋字，这样更简明易为。

南部义筹的建议远不及前岛密的严密，而纵观上述资料，他们在改良文字上的观念是有出入的，即一者是要以假名文字为国字，一者是要以洋字（罗马字）为国字。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的主张又是相同的，就是要创立日本独立之学，南部义筹称之为“国学”，这导致他们在国字改良的目标上不失共通性——均亟待创立国字，以国字开展新教育，并使国字成为公文书的标准书写文字。但是在去汉学就西学的态度上，前岛密显然要比南部义筹更加决绝，在南部义筹的观念里，他并不反对有国学基础的人去选学汉学，他也没有公然提出要废除汉字。由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提出文字文章改良的维新者，其动机首先在于确立日本的独立学问——国学，也就是既不应再将自中古时期传入日本的汉学等同于学问，亦不能以近来传入之西学简单视作日本新学问的全部构成内容。那么诸如前岛密、南部义筹等维新者眼中的“国学”，其内涵又是什么？依据上述两人的言说，我们可以分析说，他们口中的“国学”应该包含了汉学、西学、和学三方面内容，不过就上述三项学问应在“国学”中占据多少比重，两人态度不一，鉴于和学的实际成就，其实质是汉学、西学之争，明治初期，汉学的地位虽仍未被撼动，但颓势已现雏形，汉学之

---

① 南部义筹《修国语论》，http://www.geocities.jp/masa_mip/Bunko/syuukok.html.

载体——汉字的命运遂步入堪忧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前岛密与南部义筹分别开启了日本国字改良的两个方向，或以假名文字为国字，或以洋字为国字，他们都不主张在日用文以及公文书内使用汉字，他们把汉字的适用范围缩减至专习汉学的阶层内。这样的主张在幕末乃至明治初期并不能获得在朝抑或在野士族的积极回应。即便对于开启明治维新的新政府而言，抛弃曾长期视作官学的汉学，尚需渡过心理上的徘徊乃至适应期。前岛密、南部义筹等人几次上书虽未获得直接回应，但政府对于文字改良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在南部义筹向文部省提交《修国语论》后的当年 7 月，文部卿大木乔任因有意采纳削减汉字之议，遂令田中义廉、大槻修二、久保吉人、小泽圭次郎等人编纂新字书[1]，明治 6 年，由文部省出版的《新撰字书》问世。该字书是文部省首次做出最初汉字节减决策的产物，选取汉字 3167 字。也就是说，初步将书写中的基本汉字使用量定为 3167 字。

在明治初期的日本，抛弃汉学乃至全废汉字，不仅不为旧教育方式所培育的大部分社会精英所接纳，相反由于教育对庶民的开放，汉字乃至汉学热逆市在民间掀起。文部省出版新字书——《新撰字书》的行为不过出于规范在今后新教育实施过程中的汉字教育目标的目的，但随着新教育体制即学制的即将出台，中央政府确实不得不正视以何种文字、何种文章体例编纂教科书这一棘手问题，如此文字改良者的机遇也随之显现。

在日本政府公布学制即全面推行近代教育体制前，近代教育学校的试办已然展开。旧京——京都于明治 4 年 3 月分别在上京区、下京区各设置公立学校 33 所，招收男女学生 25747 人，其中中学生 637 人，小学生则在 2 万以上。小学校的教授科目为句读、笔道、算术。[2] 而新京——东京于翌年即明治 5 年 5 月在东京府厅内开设小学师范学校并附属小学校，招收师范生 24 人，小学生 90 人。科目教授依照外国小学的规则进行，配备一名翻译。这所学校为官费，师范生每人每月 10 日元，小学生每人每月 8 日元。[3] 显然，京都所设立的学校从形式上虽然趋于近代教育方式，但其教育内容却又是原以庶民子弟为教育对象的寺子屋的翻版，所谓换汤不换药；而东京所设立的学校却堪称首个近代学校，其教育形式以及课程内容均参照了西方模式。该校 5 月招生，7 月开学，因是官费，故不乏欲入学者。

在如此背景下，明治政府在挂出维新旗帜的第五年即明治 5 年的 8 月 2 日，公布学制的施行。依照这项全民教育体制，日本全国被分为 8 个大学区、256 个中学区、53760 个小学区，各学区内设置大、中、小学校各一个，也就是说，若该项体制能得到全面贯彻，日本全国将有 8 所大学、256 所中学、53760 所小学（指普通小学校），可实现 40% 的国民接受初级教育的目标。[4] 学制所要建构的教育体系与前述前岛密所递交的提案有许多相吻合之处，这也说明该体制的制定基本模仿了欧洲国家的教育模式。在学制被颁布一个多后，文部省又公布《小学教则》，明确小学校的教科课程以及教授方法。按照学制规定的初等教育大纲，普通小学校被分为上、下等，各八级，每级教育时间为 6 个月，即下等 4 年，上等 4 年，完成小学教育共需 8 年。其教育课程以欧美教育内容为参考，打破以往寺子屋只教授句读、笔道、算术三科目之状态，选择介绍欧美近代文化的启蒙书和西学译书为教科书，因尚未形成统一的教学方案，各学校暂时可采用东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办法实施教学。

根据东京师范学校制定的上、下等小学教则，其下等小学校的教科有读物、算术、习字、书取、作文、问答、复读、体操等八科，其中读物、算术、习字、问答为主要科目。这一课程设置其实是与文部省颁布的《小学教则》的方针有出入的，即主科中读物、算术、习字三科不过延

---

① 国语调查委员会编纂《国字国语改良论说年表》，第 3 页。
② 朝仓治彦、稻村彻元编《明治世相编年词典》，东京堂，1998 年，第 49 页。
③ 朝仓治彦、稻村彻元编《明治世相编年词典》，第 72 页。
④ 朝仓治彦、稻村彻元编《明治世相编年词典》，第 77 页。

续了从前寺子屋句读、笔道、算术三科的教育目的，而问答一科也只是部分涉及到近代西学内容，远离《小学教则》所要达成的目标。虽如此，东京师范学校的小学教育则已然成为各地小学校的办学指南，在成熟的教科书未被系统编纂、出版之前，东京师范学校所指定的小学校用教科书成为其他学校的重要参考或首选。

笔者选取了一本明治6年5月出版的小学用《初级读本》即“读物”教科的教科书为例，来尝试考证汉字、汉文在当时小学教育中的使用状况。该读本由31篇小文章组成，内容大致分为品行、自然知识、理科知识、西方事物介绍等几类，其中品行类文章居多，有21篇，如《童子与狼》、《不可说谎》、《伪是什么》、《童子应该被赞扬的事》、《母子之爱》、《不守信的事》、《不要害怕被人嘲弄》等；余者10篇分别为自然知识类如《地球太阳以及月亮》、理科知识类如《球与瓶》、西方事物介绍类如《合众国第一大统领华盛顿年少时期的故事》等文章所占据。从上述编排可以看出，“读物”教科的主要教育目标应是品行教育①。从下列某篇文章段落我们尚可一窥这些小文章是用什么文章体例来书写的。

地球ハ静ニ止マツテ動カザルモノニアラス譬ヘハ獨樂ノ廻ハルカ如ク絶ヘズ其軸ニテ廻轉シテ晝夜ノ區別ヲ為シ又一年ノ間ニ太陽ノ周圍ヲ廻轉シテ春夏秋冬ノ區別ヲ為スモノナリ②

这显然是汉文直译体。据此可知，尽管有使用平假名或洋字的呼声，但经政府许可发行的教科书依然使用汉文直译体，以片假名配合汉字的汉文直译体依然是正规文书的书写体例。如前述，对于文字改良的态度，政府的回应仅停留在汉字节减阶段，即明治6年由文部省出版发行的《新撰字书》仅收纳汉字3167字。不过《新撰字书》的使用对象并不针对小学生，应该是完成小学、中学两阶段教育的人群。那么，在明治初期，按照教育规划，小学生应该掌握多少汉字呢？笔者通过对一部《小学读本字引》的考察，试图来解决上述问题。

笔者选定的一部出版于明治7年的官许《小学读本字引》。这部字引共计三卷。第一卷收纳语词（分纯汉语词与假汉字而成的日语词）663条计801个汉字；第二卷收纳语词292条计380个汉字；第三卷收纳语词298条计341个汉字。如此，全书共收纳语词1243条计1522个汉字③。也就说，小学毕业生应掌握语词1200余条计1500个以上汉字。这个数据约占《新撰字书》3167字的一半，另1500余汉字的掌握需要靠中学或中学以上教育来实现。

这个教育计划与文字改良者所期许的目标显然有很大差距。学制颁布前的明治5年7月，持续发出改革呼声的前岛密抓住时机向当时的文部卿大木递交《在学制实施前应先改良国字之私见》，再次提请当局在即将开展的新教育中应废汉字，以假名文字为国字；在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后，于明治6年，他继续向右大臣上呈《国字改良相成度卑见内申书》，这次的上书依然没有得到答复④。与前岛密的冒进不同，同时期积极参与文字改良运动的西学者福泽渝吉却提出了逐渐改良的主张，并力行实践，编纂《文字之教》一书，迈出尝试逐步废除汉字、使用假名的一步。

福泽渝吉于《文字之教》的序言中如此写道：自古日本以汉字进行书写，今日遽然要废弃汉字，实非易事，亦不合时宜。废除汉字之时机虽尚未来临，但吾辈应为将来之废除汉字做出相应准备。他的方法是节减汉字数量，即可将日常用汉字削减至二至三千字，他所编纂的这本书所收纳的汉字语词即不足二千，他解释掌握这些词语虽不足以释读汉籍，但于日常使用则足矣。他谈到不能全废汉字的理由，比如医者、石屋等词语使用汉字比较方便，不过诸如“上ル、登ル、昇ル、攀（のぼ）”等词语，若一一用汉字加以区分来书写，实在是繁复不堪，使用假名文字显

---

① 福泽英之助编《初级读本》，出版地不明，1873年，目录。
② 福泽英之助编《初级读本》，卷之一，第2页。
③ 山本尹中《小学读本字引》，六书房，1874年。
④ 国语调查委员会编纂《国字国语改良论说年表》，第2页。

然要方便①。《文字之教》是针对小学用所编纂的一本字书，虽然收纳了近 2000 条词语，但新出汉字仅 928 字，并不是他所提到的目标——二至三千字。看来这个目标也是要在完成中学以上教育才能达成，况且这个目标与《新撰字书》的规模相去不远，因此可以说福泽渝吉的文字改良诉求走的是一条温和之路，只不过在小学阶段，他期待在汉字节减方面政府能做出更大妥协。

除了上述声音，于明治 7 年开办的《明六杂志》再次将国字国语方面的论争推出一个小浪潮。这就是《明六杂志》的创刊号上刊载了两篇意见相左的文章，即西周撰写的《论以洋字书写国语》和西村茂树评说西周主张的撰文——《基于开化所引发的关于文字改良之论争》。《明六杂志》是一本思想启蒙者所创办的杂志，在当时人们对西学茫然未知的社会背景下，针对东西方文明的各自主张，向社会发出摆脱东洋、师从西洋的呼声。而国语国字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以本国语言进行表述。在诉求者的眼里，为了文明开化，日本必须脱离已经落后的东洋文明，去融入到先进的西洋文明，而欲要摆脱中国人的影响，就要简化文字，以消除不能读书的人。但是在这一进程中，西周在题为《论以洋字书写国语》一文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前岛密更加过激，即不仅要废除汉字，还要废除假名，直接以洋字即罗马字作为日本语的标记方式。他说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西方语言容易掌握，且于翻译西学著作之际，可直接利用西学语词，无须去寻找或制造对应的日本语词②。西周的言论并非英雄孤胆，前述南部义筹其实已经提出应以洋字为国语的建议，《明六杂志》的发起人之一、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森有礼也于明治 5 年明确提出过以英语取代国语的主张。不过针对西周的这篇言论，作为《明六杂志》另一位发起人的西村茂树却呼吁在现阶段人们首要关注的改革点在于实施怎样的近代教育，而不是纠结于文字改良。显然，在西村茂树的眼里，在人们观念尚未向西转之前，过早提出文字改良主张徒然浪费精力，尤其欲遽然 180 度大转弯废汉就洋更是想入非非，与其做此愚不可及之事，不如积极推进近代教育，在养成人们崇尚西学之事业上下功夫。

继西周与西村茂树的论争，《明六杂志》于明治 7 年 5 月第 7 号、明治 7 年 6 月第 11 号又分别刊载了曾在幕末时期曾担任过英文翻译的西学家清之卯三郎的文章——《平假名之说》以及阪古素题为《质疑一则》的文章，前者论说平假名作为国语乃最适宜之事，后者论说世界各国应使用统一的语言文字。对于民间的上述动态，政府并非丝毫不为所动。明治 7 年 8 月，文部省熊泽有义、山田元正、中村六三郎等三官员，就制定固定文体的五个提案，建议应择其一而用。之后，文部省着手召集地方官进行咨询，并要求地方展开调查以确立可行性方案。同年 8 月，文部省刊印小学教学用罗马数字图以及算用数字图，这是针对小学展开西式教育的具体措施。9 月，广岛师范学校校长久保田譲向文部省建议，应在低级小学第六级向学生教授罗马字的拼读法、连缀法以及书写法。明治 8 年 9 月，居住在东京的小田县士族渡边修次郎向文部省提交应简化日本文的建议。明治 9 年 6 月，文部省刊印西字成音图、西字浊音并清音图、罗马头字图、罗马小字图、书写头字图、书写小字图等③。这些细微的变化都预示着日本文字文体改良时代的到来。

结论

正如西村茂树所期待般，只有近代教育得到有力推行，才能唤起广大民众要求改良文字的觉醒。归根结底，日本国字国语改良之争乃为汉学、西学之争。换言之，汉学地位一日不倒，文字改良一日不会到来，而摧垮汉学地位的法宝是推进近代教育。因此，在近代教育尚未完全展开之

---

① 福泽渝吉 《第一文字之教》，序言，福泽氏版，1873 年，第 1—2 页。

② 西周 《洋字を以て国語を書するの論（论以洋字书写国语）》，《明六杂志》第 1 号，1874 年 4 月。

③ 国语调查委员会编纂 《国字国语改良论说年表》，第 4 页。

际，主张以假名文字或洋文为国字的激进改良者的提案固然得不到政府抑或民间的有力回应，即便如福泽渝吉等温和改良者所提出的倡议也不能有效激起社会的反响。在笔者前引《小学读本字引》里，其第三卷内所列词语揭示出小学高级阶段的读物所安排的西学内容较低级阶段明显增多，比如涉及几何知识的词语有“直线、弧线、纵线、圆周、斜线、距离、波线、直角、钝角、方形、不等角、锐角”等，涉及天文学知识的词语有“天体、实体、恒星、旋形、运行、运动、轨道、赤道”等，这些词语的呈现说明一个小学毕业生应具备初步的实学知识，儒家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佐藤宽在其所著《日本语学新论》里这样谈到上述变化：洋学之兴起日盛一日，汉学遂呈衰微之势，突出者如日日刊行的新闻、杂志，面目一新，其行文开始采用欧文直译体。比如或在日常谈话中，或在演讲讨论里，经常能听到诸如“彼自身，其自身，又看呀看呀，看什么呀”等之类的直译语。但是这样的语句完全不顾及雅文的书写规则，变来变去，从表面上看，既包含雅文的因素，又包含汉文的因素，而从实质上看，雅文、汉文所具有的行文规则全部丢失，不过是和汉相混或雅俗杂处之后的产物。从诏敕谕达等政府文书，至新闻小说，各种文体并行于世，孰是孰非，未有定论，可谓乱象横生①。佐藤宽所说的这些现象在明治7年前后即19世纪70年代尚未出现。那个时候，首批学制下的小学生还在培养中，但当他们渡过遥遥8年的小学生涯后，日本开始拥有首批具有初步近代西方意识的知识者，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基础力量。

主要参考文献

［1］ 朝仓治彦、稻村彻元编 《明治世相编年词典》，东京：东京堂，1998年。
［2］ 荻生徂徕 《译文全谛》，东京：须原屋书店，1908年。
［3］ 福泽英之助编 《初级读本》，出版地不明，1873年。
［4］ 国语调查委员会编 《国字国语改良论说年表》，日本书籍株式会社，1904年。
［5］ 前岛密 《国字国文改良建议书》，非卖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1899年。
［6］ 山本尹中 《小学读本字引》，东京：六书房，1874年。
［7］ 佐藤宽 《日本语学新论》，东京：文明馆，1891年。

The Statu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ritten Chinese in Japan circa 1868

CAO Wen（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RenminUniversity of China；caowen330@ sina. com）

By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modernization movement that began in European gradually had spread to East Asia. Unlike China，after some initial wavering，Japan steadfastly followed the European path of modernization. Putting all its effort in this direction，Japan quickly faced the following issue: What language should be used to educate the people? There was also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modernization Japanese would trea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Japanese kana syllabary. Public opinion was divided between those who wanted to abandon Chinese characters completely and those who thought amount of Chinese used could be appropriately reduce. Based on the author' s observations，when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had yet to be launched in the 1860s，the reformers who advocated the radical reform of kana syllabary and Western languages as national language were unable to obtain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people，and even moderate reformers like Fukazawa Yukichi who supported reform could not obtain support for Japanese society. Japanese intellectuals had yet to advocate language reform as part of initial Westernizing reform，and instead they advocated the power of basic social reforms.

① 佐藤宽 《日本语学新论》，第76—80页。